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十四）

从表面上看，文革是一场以“破旧立新”为旗帜的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做些具体的文化学研究，就不难发现：文革中极为流行的许许多多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其实反倒是复活了最原始古老的文化形态。

由于以往人们对于“蛮性遗留”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演变极少关注，所以上述结论初听起来似乎不易理解，故本文就从分析一些人们非常熟悉、在文革中爆发流行的大众行为方式入手，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向原始的巫术信仰和巫术方法“返祖”的。

◇ 一、“剃鬼头”与通过剃发而戕害灵魂的巫术方法

文革时，极为流行用强暴的方法剃去被揪斗者的头发。这种施暴方式在当时被称为“剃鬼头”。从字面上看，“剃鬼头”三字有两重意思：一是对于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敌人要剃去他们的头发；二是对于敌对的人们要用剃光头发的方式使之成为“鬼”。那么，头发与鬼神的关系是什么呢？

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普遍认为人的头发、指甲、衣服、名字、影像等物与人的灵魂之间，有着神秘而密切的“互渗”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灵魂必然通过“互渗”而寄寓在头发、姓名、影像等等之中。因此，只要伤害了其中任何一种，就可以相应地杀死该人的灵魂。由于丧失了头发就会产生如此致命的危险，所以对于头发等物的禁忌是世界许多民族原始宗教中的重要内容。著名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巨著《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专门写有《头发的禁忌》一节，对于这种原始禁忌及其宗教原理做了极详细的介绍：

既然头部被看得如此神圣，碰它一下也是严重的触犯，那么……理发时有可能干扰头部的神灵，损伤了它，受到愤怒惩罚的危险。其次……因为原始人相信自己身体各个部份同自己有着触染关系……因此，这些部份，如剪下的头发和指甲，倘受到损害、也会损害自己……（所以）法兰克人的国王从来不让剪短他的头发……

如果剪去他们披拂肩头的长发，就等于否认他们为国王的权利……西非的一个黑人氏族霍人，他们的祭司一辈子也不让剃刀上头。有神祇附身的人也不得剪去头发，否则必被处死。……事实上头发是被看作个人的神祇居住之处，如果剪去头发，则这位祭司身上的神祇便失去了居处。

这种信仰在西方文化中著名的例子，比如《圣经》所述希伯来英雄参孙的无穷神力来源于他的头发，所以神早就告诫其母不能为参孙理发；后来敌人设法剪去其发，参孙遂失去神力而被俘，中国同样也广泛存在着类似信仰，例如在云南傣族的神话中，无恶不作的魔王法力极大，水火刀剑皆不能损伤他。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办法能弄死我。就是拔下我一根头发，勒我的脖子。”

因为头发是神圣和神秘力量寄寓的地方，所以原始宗教认为“被发”（散披着头发）则有神力，例如《录异传》记秦文公命骑兵攻击车水中的神兽，开始时不能取胜，后来因为骑兵偶然之间“髻解被发”，遂使神兽畏惧退避。因为这个原理，所以一般巫师道士请神作法时皆要“被发”；而从反面来说，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罪犯、敌人和奴隶则要通过剃其发而摧毁和剥夺他可能具有的神性庇护力量，故此中国古代流行“髡刑”，从汉代画像砖上的图画可知，2000多年前就流行的此类刑法竟然与后来红卫兵施之于“牛鬼蛇神”的凌辱几乎毫无二致。直至汉代，对奴隶除了要以铁圈束颈之外，还要剃其发，两刑合称“髡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为剃去头发即可破坏受害者的神力或剥夺其神性庇护，甚至可以进而祛除、杀死其灵魂这种巫术信仰，不仅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而且直

到本世纪仍为民众所尊奉。例如某些义和团团民“除妖灭鬼”的手法之一，即是将捕获的“二毛子”、“三毛子”（当时对信奉基督教、使用洋货、主张学习西法的中国人之诅咒性称呼），先镊其须髯且尽，再将其杀戮。所以，在这样久远而普遍的原始宗教信仰基础上，红卫兵对被害者施以“剃鬼头”等等刑罚，也就是不用思索而自然合于古法了。

除了“剃鬼头”之外，红卫兵还对被害者的头部施以各种摧残。例如1966年8月2日北京孔庙的批斗会上，向众多“黑帮”头上倒墨汁，又如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在北京第六中学设立的监狱中，就有“油漆涂脸”，“火烧头发”等刑罚。而与前述原因相似，这些刑罚也都与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在此信仰基础上产生的历代酷刑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已经知道，头发残损者会失去神灵的庇护，其实，这种关系也存在于身体的其他部份，所以巫术文化的原则是：祭司要由身体无伤疤者担当；而形貌、肢体毁伤者则不为神佑，所以古人反复强调：“大辱加于身，支体毁伤……祭不得为昭穆之尸，食不得（原文缺一字——作者注）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刑残之人不宜与祭”。在中国广大民间，也普遍存在以残疾人为不吉的民俗信仰，由于只要污残了某人形貌和肢体，也就同时祛除了神灵对其的庇护，所以古代就有对于凶死者和罪犯以墨污面的巫俗和刑法（墨刑，穷黥）；对死刑犯也要先黥面、残肢而后杀戮，直到明代，将罪犯游街示众时，还一定要将他们的脸涂黑。这些传承有序的巫术方法，无疑即是后来文革时以墨或油漆污涂“牛鬼蛇神”面容等暴行的师承之源。

文革时还有用更为残酷的刑法污辱人的头部的例子，如山西省某县“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这样的折磨与侮辱当然是出于对“牛鬼蛇神”极度的仇恨。而我们知道，古人对于他们极为仇视的异族酋长（巫术时代，酋长往往兼为巫师）和死敌，也常常用粪污其首的办法施以最严厉的厌胜术，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粪便具有“以污禁鬼”的效力，而“许多民族都把头部看得特别神圣。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认为它有神灵……是人的主宰，监护者和引导者”。因为头具有特别突出的神性，而敌族酋长又是敌对图腾的主要体现者，所以往往就要用各种残酷的方法侮辱损害其头颅，粪污其首亦是此类酷法之一，因为从宗教学原理来看，“驱除恶魔最好的办法是折磨它，或者侮辱它的自尊心，（所以）人们使用了臭气和令人作呕的东西”，这种驱鬼法的流传也就使“粪污敌首”的厌胜术进一步扩展为最酷虐的人身侮辱方法。古时的例子，比如北魏崔浩被皇帝惜故诛戮时的情形，“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这手段就与文革时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粪桶、往他们脸上溅粪水几乎一模一样了。

◇ 二、强迫受害者穿着丑恶服饰的宗教学目的

下面再来看文革时流行的以丑恶的服饰侮辱众多的“牛鬼蛇神”。

在原始文化来看，人的生命和灵魂与衣服饰物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的“互渗”联系。所以，对衣服的处理方式也就直接关系着衣着灵魂和生命的安危，从正面来说，人们必须千方百计强化和突出服饰的神圣性，并由此而使灵魂得到庇佑。例如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中，大巫师戴的帽子是一切法器中最具神性的一种，帽上绘着日月以及各种镇鬼之物，所以这种帽子可以保佑巫师的灵魂不为魔鬼所侵害；又如在道士打醮的仪式上，众多的信徒都要花钱请道士在自己的衣物上盖上“玄天上帝”的印鉴，认为有了这样的衣服，自己就可以得到神灵的护佑而免于灾祸。源于同样的巫术信仰，民间流行为了保佑儿童的平安而给他戴上绣绘有福，禄，寿三星或八仙贺寿图文的帽子，身上裹着有八卦图符和咒语的包被，佩带寄名锁、

护身符、长命缕、厌胜钱、玉璧玉琮等等。晋人司马彪曾在《续汉书·舆服志·下》中概括服饰与原始宗教的关系：“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上龙华虫，作缡宗彝”。这话初看起来很玄虚，但实际的意思也仍是说：服饰及其图饰上凝聚着来自天地神明的神圣性，所以服饰甚至具有与宗庙和祭器等神圣的器物相似的纹饰的作用。

在原始信仰中，服饰既然与神力具有这样直接的关系，那么从“黑巫术”（人类学把目的在于加害他人的法术称为“黑巫术”）的角度来说，为了战胜敌人的灵魂，也就必须破除其服饰上的上述神性，著名的例子比如罗马司令官彼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这种“荆冠”除了标志耻辱罪恶以外，更主要的当然是为了用其毒性戕害受难者的灵魂。

更残酷、也是与文革更为相似的例子，则是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法庭对异教徒的迫害：

犯人不仅要受到上述各种宗教上的惩罚，而且还必须佩带“耻辱标”——一种十字架式的粗麻布条带。……在西班牙，犯人则必须戴尖顶小帽（小丑帽），身穿缝上了绘着魔鬼和红色火舌图画黄色无袖衬衫。犯人无论在家里、街上或工作时一律都要佩带，并终此一生，破旧了就换上新的。

从这类服饰上的魔鬼，火焰等图案，我们不难知道宗教法庭上对异教徒的人身侮辱，正是建立在相信可以通过丑化服饰而制服魔鬼，戕杀其灵魂之巫术观念上的。

（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普遍认为人能够祛除邪祟，所以中世纪宗教法庭要用服饰上的火焰制服魔鬼，后来文革中亿万人都都习惯高呼“火烧牛鬼蛇神”之类口号。）

在中国古代，也同样流行着这种原始文化观念和巫术手法。人们认为：同地震，日蚀、山崩等等神秘异常的危害一样，某些异常的服饰也因为与神秘的降灾致喜的魔力相联系而预示着巨大的灾害，所以它们被称为“妖服”。历代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大量关于“妖服”如何是国家灾难之朕兆的记述，可见这种巫术信仰之普遍，郑重和根深蒂固。如《汉书》言：“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同样，“妖服”也标示着个人的灾祸，例如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出征时穿着不吉的服饰，当时人们就因此认定他不会有好结果，后来他果然被谗自杀。

“妖服”既然因渗透着神秘的致害魔力而可以给人带来灾祸，那么人们当然也就可以通过主动对敌人施以“妖服”的办法而戕害其灵魂。因此，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强迫异教者穿画有魔鬼和火焰的服饰十分相似，中国在很古老的年代就已强迫罪犯穿赤褐色的“赭衣”，这是因为红色具有祛除鬼魅的巫力。另外，还流行强迫罪犯头戴黑巾（古代称为“墨幪”）以为耻辱的标志，这种做法当然也是起源于我们曾介绍过的以污物，墨秽而祛除鬼魅的厌胜巫术，并且与后来文革时往“牛鬼蛇神”的头上倒墨等等方法十分相近。

另外，强迫敌人穿着“妖服”的惩罚还经常与其他厌胜巫术的手段同时使用。

例如汉代初年：季布为了逃避刘邦的搜捕不得不化装成奴隶。不仅“髡钳”，而且“衣赭衣”。这种加倍的侮辱当然就更像文革时对受害者“剃鬼头”之后还要强迫他们穿上丑恶的服饰了——例如在1966年揪斗“牛鬼蛇神”的高潮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位学者在被剃了“鬼头”之后，还被“扣上字纸篓子

，命他戴着回家”。

◇ 三、古代的“明刑”与文革中流行的类似刑法以及它们的共同原理

除此之外，文革中还有许多人身侮辱的手段不仅直接袭用了中国古代的刑法，而且从文化根源上说，它们也都与原始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古代典籍中记述的以“明刑”对罪犯的侮辱和惩罚：

加明刑者，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著之背也……以耻辱之。

明刑者，以板牍书真罪状与姓名，著于背，表示于人。

我们可以把上述古代的“明刑”与文革时的“挂黑牌”，“戴高帽”做一比较，例如杨绛女士记述的她与丈夫钱钟书先生在1966年的遭遇：

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

一位中年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这类批斗方法在文革中被极为广泛地使用。例如夏衍回忆：“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一望可知，这些完全是古代“明刑”之大普及。

但是，为什么从古代到文革都必须用这种方法加害于人呢？原来在原始文化看来，人的灵魂往往寄寓在他的姓名、影像等等之中，所以如果伤害了人的姓名和影像，也就可以将人真的杀死——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用戕害贾宝玉等人姓名和偶像的办法几乎置他们于死地；又比如文革中流行在人的姓名上打X、倒写姓名等等，姓名以及寄寓其中的灵魂既然最易受到各种有意无意的侵害，所以从白巫术（人类学把目的在于致福避祸的种种法术统称为“白巫术”）来说，民间即流行用“寄名锁”一类随身法器将姓名深藏扃固起来的避难方法；而从反面的“黑巫术”来说，则要千方百计将敌人的姓名及罪名暴诸天下，使之成为千夫所指、万口诅咒的对象，由此而杀死寄寓在敌人姓名中的灵魂，于是古时历代沿用的“明刑”和后来文革时的“挂黑牌”，“戴高帽”、在大庭广众中敲锣高声自报姓名和罪名，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降灾致害的巫术手段就都被发明和推广开来了。

◇ 结 语

我们说，文革所以能够使亿万国民一起狂热地投身于那无比邪恶的巨涛之中，这当然决不仅仅是少数领导者个人意志和阴谋诡计的结果，相反，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能来源于某种早已普遍根植于整个民族信仰心理和行为方式中的深层文化基因。荣格曾指出，很多时候，现代人往往不自觉地受到浸透了原始文化精神的集

体无意识的支配：

原型是我们心理结构中的一种元素，它也就成了我们心理机制中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它代表或体现了不明的原始心灵的某些本能资料，而这些本能资料正是意识产生的真正的但看不见的根源，……即使在今天（它）也是全部宗教生活的本质和显示的基础。

早在20年代，周作人也针对中国社会中大量积淀的“蛮性遗留”而指出：

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把这底下的情形调查一番，看中国民间信仰思想到底是怎样，我想这倒不是一件徒然的事。文化的程度以文明社会里的野蛮人之多少为比例，在中国是怎样一个比例呢？

而通过对文革文化基因的分析，也使我们意识到：更充份地研究和认识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古老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基因，是保证我们避免重蹈文革之类“蛮性”的灾难，保证我们最终能够进入理性时代所必须的。

□ 原载《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作者王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 ∞ ∞ ∞ ∞ ∞ ∞ ∞ ∞
“写作组”初探
• 丁 东 •

文革中的写作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仅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一些初步探讨。

◇ 一、为什么要研究写作组

文革是一段歧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黑暗年代，科学教育都受到严重摧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文革发生的时间长达10年，在这10年当中，知识界除了受冲击、受批判、接受“再教育”之外，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知识活动。姑且不讨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活动，仅仅就社会人文方面而言，我以为有两种情况应当值得注意。一种是敢于独立思考，向当时主流思想挑战的知识分子，老年的如张闻天、顾准、恽逸群，年青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和人格遗产都是极其宝贵的。但在当时的知识界中，他们毕竟只是凤毛麟角。另一种就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知识分子，本文要讨论的写作组就是代表。过去，把写作组判定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其实，“四人帮”本身也是御用工具。主宰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面貌，“四人帮”还不够资格。所以，我觉得，把写作组判断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比较恰当。写作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可以把它的性质定位为隶属于官方的文人群体。其中有一些写作组，比如上海市委写作组、北大清华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组，直接在政权中枢的授意下写作，可以称之为御用文人群体。这个群体的功能首先不是学术性质的，而是政治性质的。研究他们，对于我们认识文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典型意义。

参加写作组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人的学术能力都比较强。文革刚结束时，曾经嘲笑林彪、“四人帮”用的人是“草包”。这不尽符合事实。他们用人的标准首先是听话，在此基础上也要看能力。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就是舞文弄墨出身，谁学问多、笔头子硬，他们有分辨能力。所以，选入写作组的人，肚子里都是有墨水的，一部份还是某一学科的顶级专家。文革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政治信息不透明，学术思想信息的传播也受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时候，有

机会接触到较多的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的学术资料和思想信息。与那些住监狱、蹲牛棚、下放劳动、不得不中断知识活动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是占了便宜的。就中老年成员而言，他们先他人一步回到读书写作环境；对于青年成员而言，他们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接受了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学术训练。虽然这是一种有毒的训练，但毕竟不同于没有训练。到了80年代，参加过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比较活跃，其中不少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成为写作组值得探讨的一个原因。

◇ 二、研究写作组的难度

写作组的出现和消亡，距今时间不长。但有关的史实，披露得相当少。到目前为止，只有冯友兰、周一良等少数人作了比较坦率的回忆。其余偶有文字涉及，大都语焉不详。目前，写作组成员对自己这段经历，大多讳莫如深，不愿提起。比如余秋雨，当时是石一歌的一般成员，在《学习与批判》和《朝霞》上都发表过署名文章。现在他的散文影响很大，其中有几篇谈到他70年代中期的往事，都巧妙地避开了写作组的经历。冯友兰、周一良先生写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回首平生，早把功名利禄看透，所以无需再遮遮掩掩。而年青一些的，则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他们不能够坦言过去，似乎有失君子风度。但从实际情况考虑，主要是因为内心恐惧。而这种恐惧，不无来由。因为写作组的经历毕竟仍然是他们头上一片不散的阴影。从余秋雨的《家住龙华》（《文化苦旅》263页）里看到，陈旭麓指导了100多个硕士生，在近代史研究中达到了全国第一流的水平，却承受着“磨难、折腾和倾轧”。陈先生就是被人抓住这段经历，一直评不上教授，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勉强过关。余秋雨谈到陈旭麓如此动感情，也是因为共同的经历所致。再读《陈旭麓文集》，这种压力就更清楚了。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收有他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写作组成员都是很能写的，他们能否让这段经历如实地见诸文字，除了自身的勇气，更取决于社会如何对待他们。而有关写作组的材料不公开，写作组成员回忆有顾虑，研究写作组就很难深入。

◇ 三、写作组的特点

写作组的出现并非始于文革。50年代到60年代，起草“反修”文章，都建立过类似的机构。但文革中的写作组，又有其特殊性。文革发动的途径之一，就是毛泽东通过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写文章批吴晗发难的，尔后以这些笔杆子为主，组成中央文革小组，进而取代中央书记处。这些人，对于组织写作班子，造舆论，影响政治局势，可谓轻车熟路。所以，到了文革后期，他们指挥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更多地通过写作组写文章，发号施令。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比如北大清华写作组化名“梁效”，中央党校写作组化名“唐晓文”，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其中的文艺组又化名“石一歌”，文化部写作组化名“初澜”，北京市委写作组化名“洪广思”。除了基本的、常用的笔名之外，还有许多一次性出现的笔名。读者虽然无从判断他们是哪个写作组，但他们的文章又分明口含天宪，各报转载。在法治社会下，一篇署名文章，绝无法律效力。而在当时，写作组的化名文章，却是不容质疑，不容讨论而必须贯彻执行的。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就使多少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写作组是由许多学者个体组成的，但个人的学术意志在写作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去表达统治者的政治意志，这种做法不是写作组首创，却在文革中的写作组达到极致。知识分子扮演这样的角

色，还可以向更久远的传统追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从整体上都处在御用的文化情结之中，科举制就是古代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性创造。哪个文人如果能官拜翰林，直接为皇家效力，是光宗耀祖的事。文革中的写作组当然有别于古代的翰林院。“梁效”、“罗思鼎”们的大块文章登在“两报一刊”上，到处都转载、印发、学习，但他们毕竟并不像翰林院那样名正言顺。他们担当着御用的职能，但就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内，还没有取得足够的合法性。他们的某些观点，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某些观点，却只是表达了身居高位的“四人帮”觊觎最高权力的欲望。因为当时的领导中枢并不是铁板一块，而这些写作组又直接受命于其中的一个派别，所以才要写影射文章。如果是翰林院，就用不着这么转弯抹角了。

这种又是御用工具，又是派别工具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写作组活动方式的神秘性。周一良的回忆可以佐证这一点——

梁效设立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毕竟是书生》，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四、如何总结写作组的教训

打倒“四人帮”以后，写作组声名狼藉，其中的成员也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除少数负责人外，多数人几年之后陆续回到学术或教育岗位，但对他们的谴责至今不绝。如杨炳章1998年出版的《从北大到哈佛》一书里有一段谈到：“周一良教授是历史系主任，《世界通史》的主编之一，则另有一番独特经历。文革初期也遭受批判，后来江青搞‘斗批改’，邀请北大几位教授聚会，一大半人找借口拒绝了，高兴不高兴由他去吧！惟有冯友兰、周一良几个人凑上去了，以后组成‘两校’大批判写作班子。现时是一种荣耀，过后则是一种耻辱了。许多年以后，我记得周先生去哈佛母校做过演讲，我也参加了。周先生说他自己加入‘两校’是误受蒙蔽。此种解释，显然是肤浅了一些吧？”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而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说得过去的。

参加写作组，当然是不光彩的事。但也要看到，在当时，知识分子渴望御用是普遍的心理状态。至迟从延安时代开始，做党的驯服工具已经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自律性准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以执政党的名义建立的。多数知识分子巴不得被毛主席用起来。虽然到了文革后期，不满“四人帮”的情绪已经在民间蔓延开来，“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类的民谣已经到处流传，但多数人的不满情绪也只是停留在针对几个“奸臣”的层次上，而对毛泽东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不敢怀疑的。真正从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上能跳出来的人太少了。不能脱离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在整体上已经被改造得失去了独立

思考能力的历史背景来谈问题。总的来说，不管老、中、青，当年进入写作组基本上都是怀着一种荣幸，都想成为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人。能被政权所用就感激不尽了，况且还是专业范围之内呢？应该说，知识分子进入写作组时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种心态。如果笼统地判断，进写作组的人都是道德品质不端的投机者，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其中确有德性比较差的人。

当时写作组成员从年龄上可以分为三类，即老年、中年、青年。老、中、青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单独分析。像冯友兰这样解放前已经自成一家的学者，进入写作组就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原来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冯先生在他晚年作过坦诚的自我解剖。老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触及灵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到批林批孔时，毛泽东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这时不说是受宠若惊，起码也有知遇之感。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这不过是解决了安全的需要而已。中年知识分子，从走上社会之日起，所习惯的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当时进入写作组，不管是为毛泽东所用，还是为下面的各级政权所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至于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提倡与工农兵相结合，不管是大学在校生，还是中学在校生，一律进了农村、工矿、军营，接受再教育。参加写作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他们本该进入的知识文化界的机会，他们当然乐于接受，甚至求之不得。至于进去之后干什么、怎么干，他们开始并不很清楚。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悲剧首先是由时代造成的，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是历史的态度。他们遵命写作，有时也追求写出一点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但总体上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框架。毛泽东的总体政策是舆论一律，是按照自己规定的模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但对大前提符合己意，而风格上又能显示个性才华的知识分子又颇感兴趣。所以有时某人文章被毛看中，称赞只言片语，即刻身价百倍。在当时，把这当做荣耀并不奇怪。如果现在还当做荣耀，未免可悲。毛泽东晚年爱读古书，谈什么问题通常不是直说，而是从古典文献中的某些片段，引伸出一个意思，显得高深莫测。当时的领导层，包括高级干部，都感到理解起来很吃力，紧跟慢跟也跟不上。这些典籍的原意，对于老学者们来说，很容易解释，但对毛泽东从哪个角度引伸，却不好琢磨。而如果解释得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责任又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早被毛泽东神圣的灵光照晕乎了。

杨炳章说到“一大半人找借口拒绝”江青邀请入写作组，是否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我心存怀疑。因为谁有这等光荣历史，恐怕早该见诸文字了。还有一种说法，学者进入写作组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30年代周作人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不甚恰当。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像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齿。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现在一些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其实，50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算是对站在前台指挥的江青心理上产生了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

的决策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当时又有几人？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有人总结写作组的教训是跟错了人。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剧，我认为，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份。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怎样才能跟对人？而在于根本就不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毛泽东常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分子就是“毛”，必须附着在“皮”上。他说这张“皮”应当是工人阶级，其实就是政权。这就使知识分子进入了失去灵魂家园的可悲境地。今天，知识分子如果仍然把自己定位成“毛”，不管附在哪张“皮”上，悲剧或迟或早总是难以避免的。写作组作为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放弃独立人格，甘心充当御用工具，却不是一页被翻过去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新讨论写作组现象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像30年前那样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痞子与红卫兵：工厂造反派的两类型

• 萧功秦 •

我也是粗读了李宪源的这篇文章（即常任：“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一文，已连载于本《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十六至六十九期——编注）。当下社会上，文革造反派普遍被视为邪恶的反角，对于批评此种流行的脸谱化观点，李兄的文章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要防止走到另一极端，把造反派美化。如果造反派都那么好，那么极左思潮社会载体何在？文革极左思潮对社会的“破坏性改造”使命由谁来承载？读一读《广西吃人风潮》这种极端的触目惊心的个案，想一想那些被异化了的造反派，不至于把对造反派的公正批评都说成是“妖魔化”。

造反派中有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造反派的目标与价值趋向也有变化。我当年还当过一千多人的中型机器厂的造反派大队队委，车间的副队长。我是过来人，全程参与了文革。无须通过历史史实考证与索隐方式，才能得知当年的实情。

就我们厂而言，造反派中可分为“痞子型”与“红卫兵型”两类人，前一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是历次运动中受到压迫与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工人，包括出身不好者，被领导认为调皮捣蛋者，有生活作风问题者，“四不清”份子，不守工厂纪律者，对现实不满者（即对领导不满者，不听话者。）以及少数有自由思想的人，等等，上海“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耿金章，以及毛泽东当年所称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潘司令”潘国平，即属此类人的代表。此类人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即走向边缘。由于有种种前科或问题，有的再次成为新的受迫害对象。

工厂里的第二类造反派，是一些工厂里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对工厂刻板枯燥乏味的生活极为厌倦，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他们宣泄这种受压抑的青春激情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正如学生们为反对考试而起来造反一样。颇有点“后现代派”味。但不幸以毛的激进左派理论为实现自己摆脱乏味僵化生活方式的手段，他们多少有些学生腔，文化程度较高些，能文会写，与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工厂里的“红卫兵”。就我厂而言，这一类人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三结合的对象，革委会中掌了权。四人帮被清算以后成为“三种人”而被整肃。此类人中自由思想者绝少，他们真正是以左为荣，千万不要以己度人，以为他们是民主派的先驱者。

第一类人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价值可以说格格不入，他们是作为现实的求生者揭竿而起造反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们只是文革中的毛泽东的同路人，是真正的痞子运动家。

由于大众与官僚之间的社会矛盾长期压抑，文革初期痞子的造反，爆发的能量甚大，于是，毛与造反派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互动：毛则误以为他的平均主义理念受到工人阶级群众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于是更相信他的平均主义是深得人心，有社会基础的，（其实痞子们并非向往平均主义的世界，而是要求生存权与不再受到政治压迫。这一点新左派诸兄可能会十分失望。）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痞子们的造反支持，又使人们误以为毛就是为民请命，帮助老百姓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这种奇特互动是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把钥匙。

痞子中的最有心计者由于造反受到毛的支持而得益。有些人成为权力暴发户。你只要想象一下本世纪初的大革命时代，农村痞子运动是如何与布尔会维克革命理想家合流的，就能很容易理解他们。“红卫兵型”则是毛的极左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是文革中的左派打手。建设性极少。然而，在殴打“黑九类份子”之狠毒与残忍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反文化”方面，这两类人都涌现出不分伯仲的冠军级人物。文革中我们厂自杀者就有十余人。

我的经历很特殊，运动初期贴了第一张炮打党委的《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于是我这个艺徒在厂里一举成名，现在想来，其中既有一种跟毛闹革命的浪漫激情，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风头主义。就具有学生腔的理想精神而言，我应属于第二种类型即“红卫兵型”，参加的造反派组织是“上海工总司”派，可以说属于痞子派。本人有朦胧朴素的自由思想，文革初期就读过南斯拉夫工厂自治的批判资料，深受其民主思想的启示。于是有意无意中，把文革朦胧地误解为通过反对官僚主义来实现人人能政治平等的理想社会。后来发现我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斗批改越深入，平均主义越制度化，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越低落。我到了运动后期，便成了逍遥派。然而我所为之投身的文革并没有放过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作为“修正主义的小爬虫”我又成为整肃对象，离“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由于我手头要做的事太多，宪源兄的文章我只粗读了一下。对此问题也不敢深入。总之，此文较他原先写的一些网文要深入一些，材料也丰富一些。这样研究下去，我认为在学术上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态度是求实的严肃的，是可以进行讨论与相互切磋的。李兄身居海外，心忧祖国，真君子也。然而说实在话，对李兄过去写的那篇《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革未必是灾难》一文，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功秦 六月十九日

◇ 引自《文化中国》网站

~~~~~

【青春有悔】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无法抚慰的岁月

• 张抗抗 •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二十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份，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份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份，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份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肯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小。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

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项虚妄的桂冠。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 ∞ ∞ ∞ ∞ ∞ ∞ ∞ ∞ ∞ ∞

丑陋的老三届

• 刘 双 •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级中学

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32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1〕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80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像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2〕，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题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150比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 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 丑陋的青春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像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得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3〕。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20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20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4〕。1976年1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

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5〕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6〕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的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 丑陋的动因

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确实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1966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69届、70届和71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69届，70届和71届的小弟

弟和小妹妹们象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像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反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A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丑陋的“自觉者”

“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1966年6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6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7），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六十一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20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8）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4）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 丑陋的实践

1965年9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

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及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众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9〕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10〕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像。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11〕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对67届、68届、69届和70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

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 纪念丑陋

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举。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未完待续）

注释：

〔1〕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

〔2〕“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到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入学是由基层推荐而不必经考试。

〔3〕1969年7月21日美国“阿波罗”号在月球登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登上月球。

〔4〕《理想之歌》：刊登在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理想之歌》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又被1976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回击“翻案风”的有力武器，并加“编者按”全文如下：“《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份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5〕《雷锋之歌》：贺敬之的长诗，发表于1964年。《三门峡梳粧台》：贺敬之的诗。发表于50年代后期。

〔6〕《相信未来》：创作于1967年，作者郭路生。这首诗被认为“朦胧诗”的开山之作。

〔7〕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信刊登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8〕“十男十女”去内蒙牧区插队的消息刊登在1967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自愿到内蒙当普通社员”。

〔9〕“走后门”：社会常用语。用于形容做事不经过正当渠道去办，而是通过人情关系去完成。

(10) 《中国知青梦》：是四川知青邓贤以云南知青生活为素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11) “张铁生”事件：在1973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考场上，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下了一段乞求上学的文字。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大肆渲染。刊登在1973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上，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 原载《黄河》1999年第二期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叶森树（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支持：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6.135.33.5]: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

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